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主编

现代化研究

STUDIES OF MODERNIZATION
THEORIES & PROCESS

第二辑



商務印書館

现代化研究

第 二 辑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化研究. 第二辑/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ISBN 7-100-03765-4

I. 现… II. 北… III. 现代化—研究—文集
IV. F11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486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XIÀN DÀI HUÀ YÁN JIŪ

现 代 化 研 究

第 二 辑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3765-4/K·765

2003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7 插页 1

定价: 39.00 元

封面题字 罗荣渠

学术顾问 郭传杰 于维栋 王玉民 郝斌 何芳川 林被甸
丁建弘

编委会 钱乘旦 陈晓律 吴恩远 虞和平 陈勇 周积明
何晓明 王加丰 吕一民 哈全安 许志宇 石冰山
常绍民 何传启 谢文惠 朱庆芳 吴述尧 邹兆辰
杨玉圣 严立贤 尹保云 赵自勇 梅俊杰 牛大勇
杨奎松 王红生 王新生 包茂红 刘一皋 高岱
董正华* 牛可* 董经胜*
(带*号者为常务编委)

助理编辑 周东华 余波

责任编辑 丛晓眉

联系地址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北大静园二院)

电话/传真 010 - 62751658

电子信箱 hiszrk@pku.edu.cn ; xdhltsina.com.cn

订购地址 100710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发行部

电话 63044891 83164425

第二辑

目 录

主题研讨:现代化模式

赵自勇:自由放任的神话

——二战后的香港工业化与政府政策…………… 1

严立贤:略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三种现代化模式…………… 34

虞和平: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早期现代化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 55

朱燕华:威权统治与民主转型:台湾与韩国的比较…………… 81

王新生:战后东亚地区政治发展

——另一种类型的政治现代化…………… 98

学术专论

彭小瑜: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现代化”

——美国天主教民族主义的兴衰…………… 115

叶南客:社会现代化的主旋律

——对“人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再认识…………… 150

夏立安:第三世界的发展与发展权

——一种法理学的视角…………… 164

王章辉:英国的相对衰落及其原因…………… 184

经济与社会:“三农”研究

- 吴理财:社会转型与“乡政”改革..... 201
- 章 铮:土地流转引发的话题..... 215

各国研究:拉丁美洲的现代化

- 林被甸:拉丁美洲国家的早期工业化
——外源性现代化道路实例研究..... 235
- 董经胜:拉美民主化巩固和新自由主义改革时代的民众主义..... 255
- 曾昭耀: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新挑战
——阿根廷发展危机的理论思考..... 275

思想·人物

- 费迎晓 丁建弘:蔡元培的教育现代化思想新探 297
- 戴万钦:陈独秀转变为马列主义者
——现代化等因素以及所造成的影响..... 314

思考·评论

- 孙代尧:现代化进程中的威权政治
——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述评..... 331
- 张卫良:英国“工业革命”问题评述..... 347
- 牛 可:现代化理论塑造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
——评《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380
- 陈文寿:“华人与现代化”研究的新探索
——评《华人与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 385
- 文礼朋:赶超型发展战略与经济挫折
——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388
- 谷 涛:反思与批判的“另类”
——评《发展的幻象》..... 393

宋培军：“后现代化”与福利国家	
——英格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述评·····	401
安 然：现代性的深化与突围	
——评《自反性现代化》·····	407

论著索引

现代化研究论文及著作索引(1999)·····	413
《现代化研究》稿约及注释规范·····	425

自由放任的神话——二战后的 香港工业化与政府政策

赵 自 勇

一、问题：对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质疑

在关于东亚奇迹的学术解释中，学者们普遍承认香港工业化的兴起是自由放任政策背景下的产物，新古典主义把香港作为支持其自由市场观点的典型，而以发展型国家理论为代表的政府干预学派则把香港看作是东亚的特例，只有少数作品赋予香港工业化和政府干预措施一种因果联系。^① 尽管香港经济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但仍然信奉19世纪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的香港政府，对私营部门合法活动实行的控制和限制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少。^② 以其新自由主义观点而著称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雷德曼甚至声称：“如果你想看运行中的资本主义，就去香港。”^③

20世纪70年代担任财政司的夏鼎基解释香港经济政策时曾说：“香港政府对经济所采取的态度是由香港经济运行的环境所形成的，常常而且

① Manuel Castells, "Four Asian Tigers With a Dragon Hea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in Richard P. Appellaum & Jeffery Henderson eds., *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p. 33-70. 该文典型地以发展型国家理论为分析工具，把香港称作“半发展型国家(政府)”(semidevelopmental state)，“仔细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香港经济发展进程之后发现，政府为创造经济增长的条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政府采取了更巧妙、更间接的方式，但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其他三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新加坡)进行的干预。”(pp. 45-46)

② 威廉·比瑟：《香港经济与未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③ 转引自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不适当地被视为自由放任主义哲学。……除了不适当外,自由放任这个词还带有一种消极的味道,会引起误解,并意味着在现代社会里运行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力量必须默然听之任之。所以不如把香港对经济的态度称之为积极的不干预主义态度更为可取。这种态度包含这样的观点,在大多数情况下,试图计划调配私营部门拥有的资金并挫败市场势力的活动,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会损害经济增长率。”^①

自由放任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经济方面毫无作为,实际上还是要发挥制衡调控作用,目的是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创造条件。按照夏鼎基的解释,自由放任或者积极不干预政策,是指政府不会为了某个部门和企业的利益而干预经济过程或影响财富分配。就是说如果为了整个香港的社会经济利益政府可以介入经济过程,而涉及具体行业或企业利益时应该由市场来调节,表面上看这种公私划分是清晰的,但现实中公私之间的界限往往并非按照客观标准来确定。多数学者把自由放任理解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少或相对地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要求。

香港经济的长期繁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使自由放任政策长期没有受到有力的挑战。到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开始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检讨,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压制作用,特别是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的消极角色。^②但这仍然没有改变整个学术界关于自由放任政策的积极评价,更没有动摇它作为香港政府意识形态的地位,甚至香港政权的变更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明确地得到保障,也被香港特区政府

① 夏鼎基:“香港政府对某些方面的政策的制定”,戴维·莱思布里奇编:《香港的营业环境》,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前言,第2页。

② Tak-Wing Ngo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p. 7-8. 该论文集典型地代表了有关香港历史的修正主义观点,强调各种社会角色发挥的作用,试图以“从下向上”的角度评价香港历史,向殖民政府是香港现代化和发展的动因这一流行观点提出了挑战。

奉为圭臬。^①

本文通过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香港的工业化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说明自由放任政策的实质和局限性,消除笼罩在自由放任政策之上的神圣光环;政策并不是基于政府声称的所谓自由主义经济理念,而是具有复杂的政治社会学背景,它的背后是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政策也与香港工业化的兴起和繁荣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倒是与工业升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无法解决而造成的非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有着密切关系;政府并不是始终严格遵守自由放任或不干预原则,对不同部门的态度依其经济上的重要性和政治上影响力大小而变;自由放任不是惟一可供政府选择的政策,或者说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所谓的好政策。

二、自由放任的政治社会学

(一) 自由贸易兴起的背景

自由放任政策在香港并非始自二战后工业化兴起之时,也并非仅仅是针对制造业部门的政策。1841年6月7日,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在进行,香港还没有正式被割让的时候,英国侵华头目义律正式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希望吸引各国商船前来贸易。^② 自由贸易政策的出台可以看作是自由放任政策的开端。后来的学者往往把它理解为殖民地政权按照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以英国本土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为依据、考虑到香港的客观条件并从促进贸易的长远发展出发做出的一个理性选择,而且被后

①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竭尽全力,……维持香港的自由经济体系。”(董建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中的讲话)“香港是当今世界上最自由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系,因为我们一直实行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坚持稳健理财政策和低税制,……(特区政府)一如既往奉行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干预市场的正常运行。”(追求卓越,共享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行政长官董建华演辞全文)《新华月报》,1997年第8期,第10、14页。

②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3页。

来香港转口贸易的繁荣证明这是一个正确选择。^①这实际上把问题简单化、理想化了。

有关东亚发展,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学者主张超越发展型国家模式为代表的国家主义(statism),强调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及在制订和实施经济政策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制度联系。^②在香港发展研究领域也同样存在这一趋势,有人提出具有相似内涵的“制度动力学”(polity dynamics)观点,把研究的着眼点从国家主义的国家机器转移到制度的组织和动力方面,制度是指国家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关系和互动。^③包括自由贸易在内的自由放任政策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政治社会学背景,是一个充满权力之争的过程,单纯从政府决策部门本身而不联系影响它的各种政治社会背景无法清楚解释各项政策形成的原因。

占领香港并不是英国政府在鸦片战争爆发时就有的战略目标,香港被割让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英国商人对华进行鸦片走私的客观需要。^④关于义律宣布香港为自由港时的具体背景以及过程,还没有看到相关的直接证据材料,但从渣甸、颠地等大鸦片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与侵华军队以及英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推测,义律不可能不受别人影响纯粹从繁荣香港贸易的长远目标考虑问题。与其说是该政策是为了能够吸引那些尚不知在何处的贸易商并使其从中受益,倒不如说是为了迎合那些已在香港落脚并具有无比实力与影响力的鸦片商——无需缴税。

(二) 商业集团与香港政治权力结构

在早期香港殖民机构的运行中,以渣甸为首的英国商人发挥着重要作

① 杨奇主编的《香港概论》中的观点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1页。

②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③ Stephen Chiu, *The Politics of Laissez-faire: Hong Kong's Strategy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pp. 13-14.

④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第二章。

用,他们向港督施压确保其商业利益被充分地照顾,一旦认为政府政策有损其利益,就会向总督提出批评和指责,其地位与影响“与一国之丞相无异”。他们通过非正式的渠道向港府或者英国本土有关机构表达其利益和意见,这种意见往往能够被采纳,甚至在商人的要求与港府的构想发生冲突时是前者获得胜利。^①在经济方面,商人与政府的主要争执出现在税收方面,自殖民地建立起斗争就已开始,几乎所有政府大幅度增加税收和开支的行动都遭到商人们的强烈反对。^②

商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要求分享政务,他们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成立选举产生的自治机构的要求,以保证政府在征税问题上能充分考虑纳税人意见,英国政府出于保证殖民统治的需要予以拒绝,但还是有限度地开放了香港政治权力系统。1850年立法局首次出现了两位非官守议员,皆由洋行大班担任。1896年行政局首次出现非官守议员,由怡和洋行总经理和一名地产商担任。两局非官守议员席位的增加,以及向华人社会的开放,也只不过是把权力有限度地向大商业利益集团开放的体现。^③

直到二战后工业化起飞时,香港的权力始终由殖民地官僚和以贸易、银行、公用事业、地产为主的大商业资产阶级共同垄断,两局中非官守议员的设置就是这种合谋关系的制度化。

按照法律香港实行行政主导制,以港督为首的官僚在政策上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甚至可以说法律上在香港“总督的权力仅次于上帝”,^④而行政局和立法局只是咨询机构,但是实际上大商人、大银行家为代表的大商业资产阶级通过担任两局非官守议员在香港政治权力框架内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自19世纪后期开始香港有一种流行说法:“香港是依次由怡和洋

① 余赴礼:“商人治港与香港经济奇迹”,《信报:财经月刊》,1995年第7期,第69页。

②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57.

③ 刘曼容:《港英政府政治制度论(1841—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306、359—362页。

④ 亚历山大·葛量洪:《葛量洪回忆录》,广角镜出版社(香港)1984年版,第141页。

行、赛马会、汇丰银行和总督进行统治的。”^①

直到1961年,两局中的非官守议员几乎全部是上述大商业公司的大股东、总经理或董事,虽有个别具有专业背景的华人,比如医生和律师,但他们也都同时是成功的商人,在许多大公司里面担任董事。在香港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主要的大洋行和汇丰银行必定会有代表进入两局,二战前的全部28位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中怡和洋行一家就占9位。^②至于来自制造业领域的代表进入两局则要迟至1964年(立法局)。尽管1964年以前非官守议员在两局中处于少数地位,但现实中政府几乎从来没有利用优势地位无视多数非官守议员的意见,官僚与商人们的密切关系使政府不会在违背后者利益的情况下出台经济政策。

(三) 商业利益左右香港经济政策

法律规定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不得提出任何导致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的动议,但可以提议削减开支。表面上这意味着代表商业利益的非官守议员在经济事务上权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完全达到了限制政府的要求。在现实中,从来都是政府倾向于提高税率以增加收入而资本家持反对意见,因为政府收入的增加最终意味着公司负担的加重。法律关于非官守议员享有削减开支的提议权实际上是商人们对政府财政上予以限制的制度保证,他们针对政府的任何增加开支和税额的动议都可以提出相反意见来表达商业阶层的利益。这一权力由于财务委员会的设置更进一步得到了保证。

财务委员会成立于1872年,由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加上布政司、财政司、及总督提名的一位官员组成,但这三位官员不参加投票表决,所以委员会由非官守议员们的态度左右。根据规定,在财政年度内任何需要增加经费的建议,均须先提交财务委员会审批,而按照惯例,政府不会在立法局的全体

^① Colin Crisswell, *The Taipans: Hong Kong's Merchant Princ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21.

^② Stephen Chiu, *The Politics of Laissez-faire: Hong Kong's Strategy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pp. 42-62.

会议上利用多数来推翻财务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所以可以说财务委员会对所有开支提案具有最后发言权,这一点得到了官守议员和非官守议员们的普遍认可。尽管这种否决权从来没有使用过,但并不说明非官守议员们的存在只有装饰作用,而是官员们在制定政策时已充分考虑了他们的意见。^①

正是由于商人的压力,香港政府采取普遍的低税制,自由贸易政策的维持应该具有相同的背景,这样商人们的经济负担处在一种低水平,而政府的财政能力却受到严重的制约,使香港成为世界上政府收入占当地生产总值比重最低的地方。在 50、60 年代,香港政府收入占当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 8.8%至 16.4%之间,保守或者说谨慎的财政政策强调收入平衡,每年都要有财政盈余,造成政府支出占当地生产总值的比重更低。^② 财政能力使香港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受到限制,成为推行自由放任或不干预政策的保证。

自由放任政策适合以转口贸易为核心的商业经济,符合具有投机、冒险和流动性特点的商业金融资本的需要,使其能够在客观环境提供的机会存在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但是该政策却不能够保证香港经济的繁荣,因为贸易机会是受外部客观政治经济环境左右的,市场波动带来的萧条以及朝鲜战争爆发后转口贸易的衰落都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英国人占领香港的目的就是为从事以鸦片走私为主的对华贸易商提供便利,结果以贸易商为代表的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在香港政治经济体制内得以制度化,自由放任因而成为香港政府的意识形态。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香港的经济政策表现出异常的僵硬和缺乏灵活性,表面上是经济理念和原则在发挥作用,实际上是权力和利益关系模式的表现。战后香港工业化兴起的时候,由于权力结构没有发生变化,自由放任政策也得以继续维持。

① 诺曼·J·迈因纳斯:《香港政府与政治》,第 178—181 页。

② Cheuk-Wah Chan, 'Hong Kong and Its Strategic Values for China and Britain (1949-196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28 No. 3 (1998), p. 358.

三、香港工业化兴起的独特机制

(一) 被忽视的二战以前的工业化

香港现代工业的起步,可以追溯到1843年当地制造的第一艘船下水,但直到19世纪末发展成绩非常有限,主要是与船运业有关的造船、修船以及装备轮船等行业。另一个主要行业炼糖业也与船运有关,是为了向欧洲商船提供货物。直到1899年第一个与船运无关的行业——水泥制造才出现。^①早在19世纪80年代,港英当局就因为对贸易前途的担忧而开始把香港未来最大的进步希望寄于工业,90年代罗便臣任港督时,更是明确提出香港应该减少对贸易的依赖,发展自己的工业。^②但是殖民地官员们对工业的重视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予以支持。

进入20世纪香港现代工业的发展加速。除了上述的船舶修造、水泥等重工业以及公用事业外,英国资本对工业并没有大的兴趣,所以制造业几乎全部由华人资本经营。由于香港本地市场狭小,工业品需要外销,东南亚和中国内地成为二战前最重要的市场,另一个市场是英国及其殖民地,因为香港产品可以享受英帝国特惠税制。港产品的外销有赖于其转口贸易港地位构筑的广泛商业网,但是这种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和本地市场的完全开放,使香港工业不仅要面临激烈的竞争而且容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造成不稳定。^③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二战前的100多年里是转口贸易推动了香港的经济繁荣,工业除了造船等少数部门外只有一些条件简陋的小企业。这一结论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工业发展水平被严重低估了。根据政府登记,1927

① P. J. Hollies, 'The Development of Light Industr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Exporter and Far Eastern Importer* 1958-1959, Hong Kong, p. 13

②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第298—299页。

③ 张晓辉:“近代香港的华资工业”,《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140—164页。

年和1940年香港的工厂数分别是1523和1142,但有学者研究发现香港工厂总数应分别为3000和7500。^①出现这种差别一个原因是在政府登记注册的企业都必须在规模上达到一定的标准,而香港大量存在的微型和家庭企业低于这种标准要求;另一原因是政府此时并没有系统地收集经济资料。

据估计,1938—1940年期间香港每年的制成品出口都在9000万元以上,占了每年总出口额的1/6以上,其中纺织品出口额大约5580万元。从技术水平来看多数工厂到30年代都已经实现了机械化,每年香港生产的产品种类超过3000种,而有些工厂工人超过了1000人。当时香港造的工业品出口达到这样的规模,以至于像英国、加拿大和中国内地都提出要用配额或关税进行限制。早在1931年香港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就占了当时工作人口的1/4和总人口的1/7,是吸收劳动力人数最多的经济部门,超过了被认为在香港最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业。^②

战前工业的被低估与当时政府的经济政策一样,是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商业利益政治上的霸权地位,造成以华人中小企业为主的工业利益阶层政治上无权,无法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也使政府不重视工业。对工业的忽视一直延续到二战后工业化起飞时期,60年代的香港政府年度报告中制造业和林业竟然占有相同的篇幅。有关的历史叙述中也只能听到那些霸权集团的声音。

战前香港政府对待工业的态度以及制定经济政策如何受商业利益影响和左右的情况,大萧条发生后有关方面在政策上的争论和政府的反应是最典型的体现。大萧条波及香港使各行业普遍呈现衰败局面,1934年香港政府组织经济委员会调查大萧条的原因及影响。当时香港工商界就香港是否应施行保护关税政策展开了激烈辩论,多数人从香港工业发展需要出发要求实行保护,而有人坚持香港应该保持自由贸易。

① Frank Leeming, "The Earlier Industrialization of Hong Kong", *Modern Asian Studies*, 1975, vol. 9, no. 3, p. 338.

② Tak-Wing Ngo, "Industrial History and the Artifice of Laissez-faire Colonialism", in Tak-Wing Ngo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pp. 122-127.

经济委员会的报告认为,香港存在的理由就是发展对华南地区的转口贸易,而自由贸易是促成香港繁荣的主要原因;香港工业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事件,不能奢望通过工业发展恢复香港经济,因为香港工业在现阶段水平之上已没有多大可以提高的余地。尽管报告对工业发展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主张政府应该在进行调查后对一些陷入困境的工厂予以帮助,但并没有说明应采取何种措施,只是提出政府不应提供财政上的补助,也不认为有哪一种港产品值得进行保护。是自由贸易还是进行保护政策,实际上是体现了商业和制造业之间的不同需要。最后政府采纳经济委员会的报告,继续推行自由贸易,拒绝在政策上鼓励工业发展,不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而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前者比后者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更大。如果我们看一下经济委员会的构成,就可以清楚地理解报告的倾向性并得到港府支持的原因:除了邮务司和英国驻港商务专员外,几乎是清一色的洋行代表。^①

(二) 香港的转口港地位与工业化的兴起

战后香港制造业出现持续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在1952—1970年期间,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成为香港经济的工业化时期。本文有时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工业化概念,即把它等同于制造业的高速增长。

现有香港经济史的研究通常把战后工业化的兴起与下面两个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一是40年代末开始外部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入,主要是中国内地特别是上海的纺织业资本和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的华人资本;二是1951年以后中转贸易的衰退刺激了香港资本的转型。^② 香港工业化的兴起通常被看作是外部因素导致的突发事件,是一个全新的现象,甚至仅仅归结为上海的纺织资本的流入。“香港的工业化实质上与纺织和成衣工业

① 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5—376页;金应熙主编:《香港史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Tak-Wing Ngo, “Industrial History and the Artifice of Laissez-faire Colonialism”, pp. 131-132.

② 陈坤耀:“经济背景”,戴维·莱思布里奇编:《香港的营业环境》,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页。